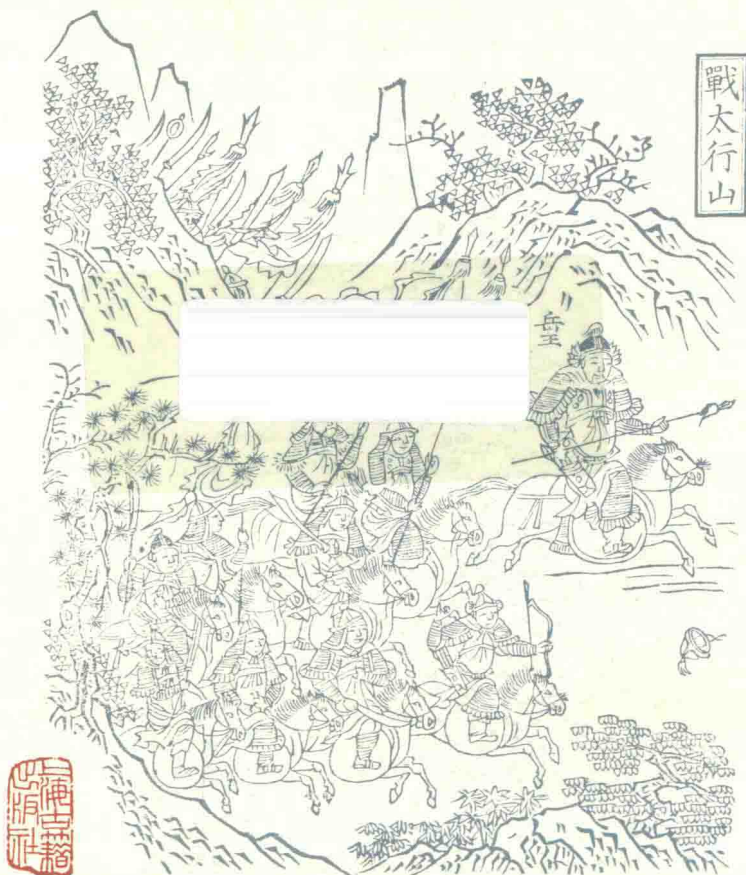


精忠錄

涂秀虹 點校

王引兵與金
人戰於太行
山擒其將拓
拔耶烏居數
日復遇敵王
單騎持丈八
鐵鎗刺殺黑
風大王金人
敗走

戰太行山



精忠錄

涂秀虹 點校

王引兵得金
人戰於太行
山衝其將郭
拔耶烏居斃
日復進斃王
單騎持火八
鐵鎗刺於黑
風火正金人
敗走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精忠錄 / 涂秀虹點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325-7274-8

I. ①精… II. ①涂… III. ①岳飛(1103~1142)—
生平事迹 IV. ①K82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00497 號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

精 忠 錄

涂秀虹 點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惠頓實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12.125 插頁 3 字數 250,000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978-7-5325-7274-8

K·1865 定價: 39.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繫

前 言

南宋抗金英雄岳飛之事，千百年來聞之者無不感慨歎歎，自宋孝宗以來歷朝封贈褒獎，文人歌詠無數，民間廣為傳播。文人志士歌之詠之尚不足表達胸臆，遂有人編輯岳飛傳記資料，附以歷代題詠之集，如此借岳飛事蹟的傳播，表達對歷史深沉的感慨。《精忠錄》就是其中一部。《精忠錄》輯錄岳飛生平史實與著述、歷代朝廷褒典與文人賦詠等，是明代增修刊行版次最多的一部岳飛紀念集，在岳飛資料彙編和選編中起着承上啟下的意義，對岳飛故事的傳播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這樣一部在史學研究和文學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的著作，在中國大陸地區卻不容易看到。我們在研究中有幸獲得日本學界友人的幫助，得到李氏朝鮮銅活字印本《精忠錄》的影印件，我們對此本作作了點校整理。

我們還注意到安徽省圖書館藏有《精忠錄》另一版本，為明刊本，鮮少為學界所關注。此本與李氏朝鮮銅活字印本關係密切，可互相參照，為了利於進一步的研究，我們也對此本作作了整理和標點，作為本書之附錄。

以下介紹《精忠錄》現存版本和版本流傳情況，以及《精忠錄》在岳飛資料彙編與選編、岳飛故事傳播中的意義。

一、《精忠錄》現存版本

現在很難確知《精忠錄》在明代增補重刊的版次，根據現存文獻可知，景泰年間（1450—1456）湯陰縣學教諭袁純就已在舊本基礎上重編《精忠錄》，至於弘治十四年（1501），鎮守浙江太監麥秀又在舊本的基礎上增集重刊《精忠錄》。弘治刊本在我國未見收藏，但此本流傳至朝鮮，今存以弘治刊本為底本的李氏朝鮮銅活字印本。正德五年（1510），鎮守浙江太監劉璟又在弘治本的基礎上釐正增補而翻刻《精忠錄》。正德刊本今未見，但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刊刻的小說《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後附有《會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後集》，包括古今褒典、古今論述、古今賦詠和李春芳後序，以此保存了正德刊本的後半本內容。

《精忠錄》現存兩種版本，按其編定時間先後分述如下：

（一）安徽省圖書館藏明刊本

現藏於安徽省圖書館的《精忠錄》，圖一卷正文三卷。圖一卷殘存二十五幅圖（包括一幅半葉殘圖），為一葉全幅大圖，圖卷版心題“精忠錄圖”。正文卷一首題“會纂南宋岳鄂武穆王傳畧一”，版心題“精忠錄傳”。卷二首題“會纂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實二”，附錄岳飛著作，“御軍之術大端有六”，“諸子”，“附孫岳珂詩敘”，版心題“精忠錄事實”，卷末題“重編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實畢”。卷三首題“集古今誥文詩歌三”，版心題“精忠錄詩文”（間有一些題“精忠錄詩”），卷末題“□歌行三終”（“歌行”二字之前模糊，未能確定殘損幾字）。

此本安徽省圖書館定為明代景泰年間袁純刊本，所定刊刻時間有誤。我們的判斷是：景泰二年（1451）至七年（1456）間，袁純搜集舊版，增補新作，編成《精忠錄》。安徽省圖書館藏本編

定于成化年間，在袁純景泰之編的基礎上增補了新的題詠詩作。

可以確定袁純於景泰年間編輯《精忠錄》。此亦見於商輅《湯陰縣精忠錄序》記載（見本書附錄）。此序不見於安徽省圖書館藏本《精忠錄》，應該是卷首殘損之故。以商輅之序結合天順元年（1457）十月《皇朝勅賜忠烈廟公移》、徐有貞《湯陰鄂王廟碑》（李氏朝鮮英祖己丑銅活字印本《精忠錄》卷四）之記載，可知袁純編輯《精忠錄》的背景：正統十四年（1449）徐有貞倡議修建湯陰鄂王廟，次年建成，景泰二年正月勅賜廟額，題為“精忠之廟”，袁純輯錄時人題詠新廟之作，編成《精忠錄》。

袁純，杭州府新城人，明正統九年（1444）甲子科舉人（《浙江通志》卷之三十“選舉”，清康熙版）。正統十四年（1449）徐有貞視察岳飛祖墓時，袁純以湯陰縣教諭身份隨郡縣官員一起陪同（《乾隆湯陰縣志》卷之一“地理志·陵墓”）。景泰七年（1456）八月，袁純由“試監察御史”“實授監察御史”（《明實錄》之《英宗睿皇帝實錄》卷二百六十九）。袁純編輯《精忠錄》大約起於景泰二年（1451），至景泰六七年間編成，但還在徵求增加新作。從陳贊與馬偉之詩序可見，此本卷末的馬偉、陳贊、邵玉應該就是袁純景泰之編最後徵求詩作的三人。商輅作序也在袁純“暨入朝為監察御史”的景泰七年（1456）前後，因為英宗復辟，商輅就被免職了。由此看來，景泰七年（1456），袁純之編《精忠錄》“將欲鉅梓”，但是何時鉅梓，則未能確定。

而現存於安徽省圖書館的這本《精忠錄》並非景泰刊本，因為此書卷三所錄詩歌有不少出於景泰之後，其中所注詩人身份為景泰之後的官職。如“九十三翁蕭山魏驥”，據《明史》列傳第四十六，魏驥於景泰元年（1450）七十七歲致仕，成化七年（1471）九十八歲卒，可見，魏驥寫此“兩河疆土志全收”一詩，或者此詩被編入《精忠錄》一書時，已是成化二年（1466）。此本《精忠錄》

從魏驥到“崑山吳璘”錄二十五位詩人，除“會稽韓陽”未注明官職而不容易確定其身份外，其餘基本可確定為天順、成化年間的官員，多能從《明史》、《明實錄》以及明陳善等修《杭州府志》卷十中查找其任職時間。其中，“河湟朱紳”注為“浙江按察使”，據《明憲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三記載，朱紳於成化八年（1472）四月由浙江按察司副使升為本司按察使。朱紳是此書中可確定任職時間最晚的一位，可見，安徽省圖書館藏本《精忠錄》在袁純景泰編本的基礎上有所增補，編定的時間在成化八年（1472）之後不久。

袁純景泰年間編輯《精忠錄》是在前人編輯基礎上的重編。商輅之序謂“精忠之錄，又繼《褒忠錄》以傳”，可見，袁純是在《褒忠錄》的基礎上重編的。安徽省圖書館藏本《精忠錄》卷三錄郭文之詩：“武穆遺踪著簡編，魯魚時久失真傳。遂令百捷功湮矣，徒使丹衷事杳然。訛舛尚資讎校正，遺□□待購求全。板行海內彰忠孝，誰不褒誇侍御□。”侍御指袁純，因為袁純由湯陰教諭升任監察御史。可見“武穆遺踪”原來已“著簡編”，但是年久歲深，已殘缺訛舛，袁純搜集此前“簡編”，校正重編，“板行海內”。現存圖像第二十四幅右葉右上方有一方框，寫着“原無題目”，正文第二卷卷末題“重編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實畢”，未能確定是景泰還是成化之編留下的重編重刻之痕迹。

從此書現存面貌來看，無論是袁純景泰年間的重編，還是成化八年（1472）以後的增補重編，都是較為粗陋的編輯，沒有考慮各卷篇幅的均衡，第三卷的詩文沒有按照文體類別或時間先後進行統籌編排。其正文三卷，篇幅大小差距很大。第一卷“傳畧”大約二千四百字，對比《宋史》本傳，有的內容因為過於簡畧而未免斷章取義。第二卷“精忠事實”部分大約一萬字，其後所附岳飛著作、御軍之術、諸子、岳珂詩敘等內容，編排較龐雜，各部分標目也不明晰。第三卷編排較亂，標目先是按文體的分

類——誥、謚、評論、序文等，接着是“國朝”的標目，“國朝”標目下一級的分類為：祭文、御製孝順事實、贊、詞、古詩、律詩、歌行、絕句。而這一“國朝”標目下的詩文包括了宋、元、明三代的作品。然後是另一“國朝名賢詩歌”的標目，又分出“律詩”、“歌行”、“排律”等類別，但律詩中有歌行，歌行中有律詩。

此本第三卷排版方式特別，常見一頁未滿，另起一頁刊刻，也有一頁中間空幾行的現象。一頁中間空幾行，可能是編排時為某人詩作預留空間；一頁未滿又起一頁，則可能是不同時間刊刻、或不同版次雕刻的原因。但是，全書版式、行款、字體相同，可見是同一時間刊刻的，但因襲了一些舊版的版面安排。以此編排方式，結合所選詩人時代前後以及詩體分類的考察，我們認為此書第三卷由兩大部分合成：

第一部分，從卷首到楊廉夫二首絕句，包括了誥、謚、評論、序文、贊、詞、古詩、律詩、絕句等。這本《精忠錄》所因襲的“舊本”最早的規模大概就是從卷首圖像到“絕句”楊廉夫二首為止的三卷，是相對完整的一部著作。

第二部分，從“國朝名賢詩歌”開始，又由幾個小部分合成：第一，“律詩”以下，從凌雲翰到會稽韓陽三十六人的律詩，此為一部分。第二，從三山謝琚開始另起一頁，到吁江左贊三首，共五人，此為歌行，為一部分。第三，從夏文表開始又另起一頁，到“歌行”之方質，共十六人，為一部分，包括了律詩和歌行。第四，又另起一頁刊刻未署名的《讀鄂王傳》、《過朱仙鎮》二首詩，自此至卷末，是最後一部分，包括袁純在內，十七位作者標注身份多為景泰年間的官職，這部分基本為題詠湯陰縣精忠廟落成之作，所謂袁純“哀集諸薦紳題詠新廟之作”就是這一部分。

（二）李氏朝鮮銅活字印本

李氏朝鮮銅活字本《精忠錄》現存李朝宣祖印本和李朝英祖

印本。如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本和宮城縣圖書館藏本為宣祖印本，而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阿川文庫藏本、御茶水圖書館成實堂文庫藏本、埼玉大學圖書館藏本，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則為英祖印本。英祖印本書前有：《精忠錄肅廟御製序》，《當寧御製後序》，《御製永柔縣卧龍祠致祭祭文》，弘治十四年陳銓《精忠錄序》，萬曆十三年李山海《精忠錄序》，《會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目錄》及圖三十六幅：《武穆像》一葉，半葉圖像，半葉像贊；《精忠錄圖》三十五幅，上文下圖，第一幅為岳飛坐像，半葉一圖，其餘三十四圖皆全葉大幅。正文卷一：宋史本傳；卷二：武穆事實，附載武穆御軍六術、武穆諸子；卷三：武穆著述，載錄岳飛所作文章詩詞；卷四：古今褒貶，古今論述；卷五：古今賦詠，分為賦贊、古詩、詞、絕句、歌行；卷六：律詩。書後有弘治十四年趙寬後序，萬曆十三年柳成龍跋。宣祖印本則無卷首之《精忠錄肅廟御製序》、《當寧御製後序》、《御製永柔縣卧龍祠致祭祭文》三篇文章，全書其餘內容相同，但存在字體、圖像細微差別。據日本大塚秀高先生介紹，此兩種版本傳入日本的時間不同，尊經閣文庫本與宮城縣圖書館本是在江戶時期傳入日本的，而阿川文庫本、成實堂文庫本與埼玉大學藏本都是後來從朝鮮（韓國）購入的（大塚秀高《關於李氏朝鮮出版的〈會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林桂如譯，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研究中心編《中國文學研究》第十一輯）。

李氏朝鮮銅活字印本《精忠錄》（以下簡稱“朝鮮本”）正文第一卷和第二卷篇幅大體相同，近一萬字。這兩部分的內容大體相似，因此第二卷標題“武穆事實”後面以小字加按語說明：“按此編與本傳互有詳略，今兩存之以備參考。”各卷標目清楚，卷次結構相對合理，卷五、卷六標目下的分類也相對合理。與安徽省圖書館藏本相比，朝鮮本編刊較為精良，二本之第二卷“武穆事

實”多有相同處，其他各卷內容差別較大。

從朝鮮本的李山海序和柳成龍跋，可知《精忠錄》於萬曆十二年甲申（即李氏朝鮮宣祖十七年，1583）流傳至朝鮮。柳成龍跋曰：“萬曆甲申，有譯官來自燕都，以《精忠錄》一帙進者，上覽之嘉嘆，下書局印出。”一位來自“燕都”的譯官把《精忠錄》獻給李朝宣祖李昖（1567—1608 在位），宣祖即下令刊行，萬曆十三年三月李山海受命作序，柳成龍作跋。

李朝肅宗己丑，即清朝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肅宗李焞（1674—1720 在位）以萬曆十三年印本為底本，重新圖寫刊印，並題寫序言。

李朝英祖己丑，即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英祖李昪（1724—1776 在位）又以肅宗己丑本為底本重新圖寫刊行。李昪把六十年前其父親李焞之序置於卷首，他自己的序次後。

萬曆甲申由燕都傳入李朝的《精忠錄》是弘治年間麥秀刊本，今從朝鮮本的內容可見其底本情況。

其一，朝鮮本在李朝君臣置於卷首卷尾的序跋之外，還有兩篇序跋，即陳銓序和趙寬後序。陳銓序作於弘治十四年（1501）九月，趙寬後序則署弘治十四年十月，兩篇序言都說到鎮守浙江的太監麥公“素秉忠愛，奉公為民之心恒眷眷焉，慕王之烈，既新其祠墓，又即舊板行《精忠錄》躬為校正而翻刻之”。可見，傳入李朝的《精忠錄》是弘治十四年（1501）刊本。由此書卷四“古今論述”屠滸《重修勅賜忠烈廟記》可知，麥公名秀。

其二，朝鮮本所選詩文截止於弘治年間之作，也可見其底本為弘治刊本。

朝鮮本編輯相當嚴謹，選篇精當而有其較為嚴密的考慮。其卷四“古今論述”所選篇目按時間順序，展示了由宋至明岳飛資料集多次編刊、岳飛墓歷次修建的過程，此篇目順序為：謝起

巖《紀事實錄本末序》、吳安朝《紀事實錄後序》、陳初庵《金佗粹編序》與戴洙序、虞集《跋宋高宗親劄賜岳飛》與《題岳飛墨蹟》、陶宗儀《敘岳武穆王墓》、瞿佑《敘岳鄂王墓》、徐有貞《湯陰鄂王廟碑》、屠瀟《重修勅賜忠烈廟記》。“古今論述”選編的最後二篇是徐有貞記載湯陰立廟的《湯陰鄂王廟碑》和屠瀟記載麥秀重修岳飛祠墓的《重修勅賜忠烈廟記》，意味着這是麥秀編輯《精忠錄》時最近的兩次修廟記事，也意味着袁純之輯和麥秀之輯是最近的兩次岳飛資料選編，兩本《精忠錄》分別彙輯了最近兩次修廟之詠。

朝鮮本卷五、卷六的詩詞與安徽省圖書館藏本卷三詩詞相對比，也可證明朝鮮本底本為弘治刊本。安徽省圖書館藏本收錄一一九人一四四首詩詞，其中二首佚名。朝鮮本收錄一四三人一六八首詩。二者在馬偉（景泰六年任杭州府同知）之前的詩詞大體相同，詩詞排序也大體相同，只是朝鮮本按照詩體編排而調整了一些詩詞的順序。朝鮮本比安徽省圖書館藏本少十一人（姚黼、張歧、朱紳、高舉、劉鼎、劉清、孫曰讓、郭文、徐順、王銳、張順），但多八人（劉基、張羽、李旻、丘濬、江瀾、楊峻、吳一貫、王壽山）。朝鮮本比安徽省圖書館藏本少的十一人，可能因為不符合選編標準而未錄，對於判斷朝鮮本底本的編刊時間意義不大。而多的八人中，劉基和張羽是明代初年人；上虞王壽山未注明官職，尚未查明其身份，但從排列在他前後的詩人來看，他之前的“盱江左贊”是弘治二年（1489）為浙江左參政，他之後的陳耘正統十一年（1446）為浙江按察司僉事，陳璇正統十四年（1449）為浙江按察使（《萬曆杭州府志》卷十一），在此任上至景泰四年（1453）（《明實錄》之《英宗睿皇帝實錄》卷二百三十二），可見王壽山的生活年代大體也是正統至弘治之間（1436—1505）；其餘五人都是弘治年間（1488—1505）的官員。引人注目的是朝鮮本

在馬偉之後所錄陳銓等二十八人皆為弘治年間的官員（官職）。這二十八人多見於屠滂《重修勅賜忠烈廟記》之銘文（朝鮮本《精忠錄》卷四），也基本見於《萬曆杭州府志》卷之十一。由此可見，朝鮮本比安徽省圖書館藏本多出的詩文絕大多數為弘治年間之作，朝鮮本所錄詩文的時間下限為弘治年間。

通過朝鮮本與安徽省圖書館藏本所載詩詞的對比，不僅可見朝鮮本的底本為弘治刊本；而且，因為二本大部分詩文相同，順序也大體相同，安徽省圖書館藏本中那些成化年間的詩作也多見於朝鮮本，可見弘治刊本是在成化年間刊本的基礎上重新編刊的。

古朝鮮複製中國書籍一般是原樣翻刻，朝鮮本《精忠錄》應該也是基本按照弘治刊本原樣複製的。根據有二：

其一，陳銓序弘治刊本謂“序其戰功列圖三十有四”，朝鮮本三十四葉戰功圖的版本面貌與此吻合。而且，朝鮮本與安徽省圖書館藏本圖像雖然構圖不同，但現存圖像標題全部相同，說明朝鮮本之底本弘治刊本是在“舊本”的基礎上按照標題重新刻圖的。

其二，朝鮮本與嘉靖年間刊行的小說熊大木編撰《大宋中興通俗演義》之圖像、附錄後集內容大多相同。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小說正文前有三十幅圖，這三十幅圖中有十五幅與朝鮮本《精忠錄》構圖和基本內容相同，還有六幅同於《精忠錄》相同標題圖像的半幅，可以看出，這些相同內容的圖像之所以存在細節上的差異，是由於小說刊刻較為粗糙的緣故。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小說正文之後附錄《會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後集》，包括古今褒典、古今論述、古今賦詠和李春芳後序。從李春芳後序可知，正德五年（1510），鎮守浙江太監劉璟

“躬為釐正而翻刻”了《精忠錄》，此附錄《會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後集》所據即為正德五年(1510)刊本。而其“古今論述”與朝鮮本卷五之“古今論述”相比，多了三篇文章，即陳銓序、趙寬後序、王華《重修勅賜忠烈廟記》，其餘選文和順序都相同。王華之文記載的是繼麥秀之後鎮守浙江的太監劉璟重修岳飛墳廟之事。其“古今賦詠”對應的是朝鮮本卷五“古今賦詠”和卷六“律詩”部分，但在“古今賦詠”部分增加了一首詩、二首詞和李春芳的歌行，“律詩”部分增加了陳鼎等正德年間十五人的詩作(參看本書附錄)。可見，正德五年(1510)劉璟刊本是在弘治麥秀刊本基礎上基本按原樣翻刻，但作了增補。因此，嘉靖本《大宋中興通俗演義》間接保留了弘治本的面貌。所以，從朝鮮本《精忠錄》與嘉靖本《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相同的圖像和詩文，也可見朝鮮本是基本按照弘治本原樣複製印刷的。

朝鮮銅活字本《精忠錄》編刊精良，版本完整，基本保留了弘治刊本的原貌，具有重要的版本價值。

二、《精忠錄》在岳飛資料彙編和選編中承上啟下的意義

由朝鮮本《精忠錄》之“古今論述”，並參考今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資料，我們可以瞭解宋代以來岳飛資料彙編和選編的基本情況，從中亦可見《精忠錄》一書在岳飛資料彙編和選編中承上啟下的意義。

《精忠錄》之前關於岳飛傳記資料的彙編或選編有岳珂《鄂國金佗稗編》與《續編》、謝起巖《忠文王紀事實錄》、住山僧可觀錄《岳忠武王廟名賢詩》、杭州岳王祠《褒忠錄》等。

最早搜集和編撰岳飛資料的是岳飛之子岳霖和岳霖之子岳

珂。宋寧宗嘉定十一年(1218),岳珂繼承父志,編成《鄂國金佗粹編》二十八卷,此後紹定元年(1228)又編成《續編》三十卷。此書記錄岳飛之事和收集相關資料最為詳備,是此後關於岳飛史實和傳說最主要的源頭,南宋史官章穎編《南宋中興四將傳》之《岳飛傳》、南宋官修《國史》中的《岳飛傳》、元代官修《宋史》之《岳飛傳》,無不出於《金佗粹編》而刪訂成之。此後岳飛資料彙編和選編中的岳飛史料,都直接或間接出於《金佗粹編》與《續編》。

由於《金佗粹編》簡帙浩繁,不便於民間傳播。宋景定年間(1260—1264),太學生謝起巖感慨岳飛之事“其在《國史》者不易見,在家集者不及見,在將傳者不多見”,因此在《金佗粹編》的基礎上編輯了《忠文王紀事實錄》五卷,包括“高宗皇帝宸翰”、“岳飛行實編年”、“行實拾遺”、“御軍之術”、“秦國夫人李氏遺事”、“諸子遺事”、“昭雪廟謚”、“籲天辨誣通敘”和七篇“奏議”,相當於《金佗粹編》的精簡普及本,滿足讀者瞭解岳飛歷史的需求。

岳珂之編與謝起巖選編主要着眼于岳飛的史實,岳珂之編收錄了時人一些評論,但目的在於佐證岳飛之史實,為岳飛辨誣。元代則有人專門彙集宋元文人對岳飛的題詠,如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宋史岳飛傳》一卷,後附《岳忠武廟名賢詩》一卷。其《宋史岳飛傳》出自元代脫脫等撰官史,《岳忠武廟名賢詩》則題“住山僧可觀錄”,可觀為元代褒忠演福禪寺之僧人,朝鮮本《精忠錄》卷四陶宗儀《敘武穆王廟》、卷五朱希顏、宇文子貞的詩序中都提及此人。此書後來又經住山僧高會重輯,今存板心有題“詩”、“後詩”、“拜王詩”、“舊詩”、“記”等,且多有補版,版式參差,可能是寺僧收錄名家題詠,隨得隨刻,陸續付雕,令人想見當時流傳的情形。黃裳在《來燕榭讀書記》中揣度此二卷同刊的原因謂:“意元史刊成,板片即在杭州,卷帙浩繁,撫印甚少。只

此一卷書以飛祠廟俱在湖上，遂取以另印之。可觀之意，亦以此為新朝官書，取弁卷首，可免紛紛之口，其微意自不難知也。”（黃裳《來燕榭讀書記》，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褒忠錄》未見流傳，但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徐階所輯《岳廟集》卷三收錄明代吳訥《褒忠錄序略》（見本書附錄）。徐階《岳廟集》注明吳訥為海虞人、都御史。據《明史》列傳四十六記載，吳訥於宣德“五年（1430）七月，進南京右僉都御史，尋進左副都御史”，正統四年（1439）致仕，十六年後即景泰六年（1455）去世。又屠瀟《重修勅賜忠烈廟記》曰：“皇朝洪武初正祀典，始建廟，至宣德間燬於火。吾浙右布政使黃公敷仲嘗新之。”（朝鮮本《精忠錄》卷五）吳訥之序未言及燬後重修，應寫於宣德焚燬之前。以此可見，《褒忠錄》編於宣德年間（1426—1435）。明代景泰年間商輅《湯陰縣精忠錄序》（見本書附錄）言及“精忠之錄，又繼《褒忠錄》以傳”，顯然，袁純《精忠錄》繼承了《褒忠錄》的編輯。袁純所輯《精忠錄》景泰本今未見，但我們從安徽省圖書館藏本和朝鮮本見其仿佛。

從“褒忠”的題名看來，《褒忠錄》應該就是在褒忠演福禪寺僧人可觀、高會之輯的基礎上編輯的。而從可觀、高會所輯《岳忠武廟名賢詩》和安徽省圖書館藏本《精忠錄》，我們可想見《褒忠錄》的體例和內容。可觀、高會之輯彙集了名賢詩、詞、祭文、記、序，文體與內容豐富。並且從可觀之輯版式參差的情況，我們就可以理解安徽省圖書館藏本《精忠錄》第三卷為何標目重疊、編排分類雜亂了，而且其版面一葉未滿又另起一葉刊刻，大概也是此前刊本原貌的留存。此本《精忠錄》第三卷有一“國朝”標目，又有一“國朝名賢詩歌”標目，這兩個標目告訴我們，假如《精忠錄》直接沿襲《褒忠錄》，則《褒忠錄》也是在前人所編基礎上的重編，前一“國朝”標目內容或為《褒忠錄》沿襲之舊版內容，

後一“國朝名賢詩歌”標目內容則可能是《褒忠錄》所新輯。因而雖說安徽省圖書館藏本編輯簡陋粗糙，但可貴地保留了舊版的痕跡，呈現出岳飛文獻編輯代代相傳的過程，令後人感受到元明時代崇敬岳飛、感慨歷史的深沉痛切的時代精神。

袁純之輯《精忠錄》的歷史背景是明代正統十四年(1449)八月的“土木之變”。徐有貞《湯陰鄂王廟碑》記載：“歲己巳之八月，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燭，上皇未復，寇方內逼，乃命侍講臣瑄等十有餘人，分鎮要地，遏亂略，糾義旅，以為京師聲援。而臣瑄寔來彰德。”(朝鮮本《精忠錄》卷四)徐有貞出鎮彰德，正好是岳飛故鄉，當此之時，國勢衰微，民心思岳，希望能有像岳飛那樣的大英雄出來拯救國家，故而徐有貞倡議建湯陰之岳王祠，朝野響應。“土木之變”，英宗被俘，民間傳聞明兵五十萬敗於蒙古族瓦剌部落二萬人，儘管今天的研究者認為五十萬之數不實，認為明清人記載有意誇大其辭，但是誇大其辭中正見民心之痛，“土木之變”始終是正統以後明代人心中無以言表之深痛。比較客觀記載“土木之變”的明代李賢《天順日錄》謂：“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此後的明朝雖曾有過短暫的“弘治中興”，但總體趨勢是內憂外患，朝政日非，江河日下。時人不敢妄議國事，但修建岳飛廟、請求封贈祭祀岳飛、多次重編刊行《精忠錄》，不能不是明代士宦諸人和廣大民眾痛心當朝局勢的隱曲表現。

在《精忠錄》之後，晚明至清代出現了很多性質相似的編撰，如《朱仙鎮岳廟集》十二卷附錄一卷，明李濂輯，嘉靖刻本；《岳集》五卷，明徐階輯，嘉靖十五年(1536)焦煜刻本；《岳武穆集》六卷，明李楨輯，萬曆二十年(1592)刊，天啟間又翻刻；《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八卷，明徐縉芳輯，萬曆四十二年(1614)刻本；《新鐫增補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彙編》十四卷，明高應科輯，崇禎元

年(1628)刻本,等等。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載,明清兩代刊刻的岳飛文集和相關資料選輯不少於二十種。產生如此之多的岳飛資料選編,或多或少都得益於《精忠錄》的廣泛傳播,直接或間接都受《精忠錄》影響,特別是選編合理、刊刻精良的弘治本以及其後刊本。這些選編不僅內容上多所繼承因襲《精忠錄》,在結構卷次、內容分類等各方面也基本與《精忠錄》(以弘治本為底本的朝鮮本)類同,不過所謂“類編”、“彙編”,追求內容更“大”更“全”,卷目更多。由此可見,在岳飛資料的選編中,《精忠錄》是一部承前啟後之作。

三、《精忠錄》的通俗性及其對岳飛故事傳播的影響

在數量繁多的岳飛資料選編中,產生最為廣泛影響的是《精忠錄》。《精忠錄》的影響不僅在於對岳飛資料選編所起的作用,也不僅在於朝鮮、日本域外的傳播,而且在於以《精忠錄》為底本,直接產生了通俗小說《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對於岳飛故事的傳播功莫大焉。

《精忠錄》的傳播有其偶然性,比如嘉靖年間福建建陽小說家熊大木讀到《精忠錄》,比如萬曆年間中國的譯官帶着《精忠錄》進入朝鮮獻給李朝宣祖,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對比多種“岳集”,我們認為《精忠錄》廣泛傳播有其必然性,其必然性之根本在於通俗性。

《精忠錄》的通俗性表現有三。

一是題目“精忠錄”簡潔而準確,比之“褒忠錄”等題名顯然更為切合岳飛題材的特點。“褒忠”,是因為杭州的岳飛祠墓在元代稱為“褒忠演福禪寺”(陶宗儀《敘岳武穆王墓》,朝鮮本《精